

日常的力量

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反思

乔焕江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常的力量

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反思

乔焕江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常的力量：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反思 / 乔焕江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495-0778-8

I. 日… II. 乔…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②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6.7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988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全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0 25 字数：230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 言

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历程中,从 90 年代开始迄今为止的二十年左右的文学实践,无疑显示出某些特殊性或异质性。对于这些特殊性或异质性的感知,实际上在 90 年代初始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就呈现出来。“后新时期”这个概念,正是文学研究界试图把握其中某些特殊性或异质性因素的努力。当然,这一概念在其初创阶段并没有迅速建立起有效的阐释框架和所指范围,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内涵;相反,围绕着这一概念的话语生产,时常体现出不同研究者面对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时所采取的观察视角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在同一个学者不同时刻的话语中,我们同样也会看到视角的游移和价值观的犹疑。然而,也正是在这些显得矛盾重重的话语中,90 年代以来文学实践的某些特殊性或异质性因素在历史力量和批评话语的不断冲刷中渐渐沉积下来,而这些因素的多样聚合,又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和文化产生新的形式观感。可以说,如果观察者选择好适当的历史切入点,就完全可能揭示出由这一时期文学开启的某种整体性特征;反过来,这一时期文学和文化的场域的形式特征,恰恰又是我们借以理解社会历史变动的具体表征,通过对文学和文化话

语实践的考察与分析,我们才可能穿透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笼罩,揭示出与话语中的种种特殊或异动缠绕在一起的社会历史目的,进而描绘出这个时期独特的社会结构。

作为“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最先提出者,谢冕先生认为:“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新时期文学内部便有新质产生并开始它的裂变:后新诗潮以反对崇高和幽雅为目标的向新诗潮的挑战,先锋小说对于传统艺术方式的强刺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创作的渗透,以及通俗文学向纯文学的大步进逼。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事实,已证明它有必要通过自身的调节和应变以适应继续前行的需要。不仅是外部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文学内部的因素,诸如对文学自身的失度和误区的调整,以及对文学增生的新品质和新形态的确认和支持,当然也有中国近期社会变动施加的压力,驱使新时期文学由‘前’向‘后’进行转型期的更迭。这种更迭不仅进一步巩固中国文革之后文学新旧交替的成果,也确认了80年代经历巨大挫折之后向冷静而沉稳的过渡十年推进,而且为业已来临的世纪之交的文学交替提供机会和可能。”^①从如上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后新时期”概念产生的外部条件很大程度上被谢冕归结为某一历史时刻的政治压力,不过,他似乎更乐意把这一新的文学开端视为文学内部的某种裂变,虽然他也提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通俗文学等问题,这些问题随后也被上升到文化转折的程度^②,但在当时,与其说是对发生在文化空间

① 谢冕:《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4期。

② 参看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的异变的认知和判断,毋宁说是立足社会转型潮头对文化转型和文学前景的预期。比如,张颐武在明确提出“所谓‘后新时期’是一个文化性的概念,它指的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所发生的新的变化”的同时,又认为“市场化和消费化并不全是悲观的预言家所看到的对文化的挑战,它更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一个中国文艺复兴的机遇”。^①实际上,从今日反观1990年代初中期的文化异变,我们就会发现,种种异变只能称得上大变局的开端,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历史冲力不仅在文学和文化内部不能被消化,而且文学和文化已经开始失去话语主体的地位,并迅速成为社会转型的表征或症候,其形态和格局的变化的确是很难通过对其内部演进规律的归纳或预期恰当解释的。

这一对文学和文化表达某种价值预期的概念的提出,实际上隐含着对加入全球历史进程之正当性的价值预期,^②因此,对“后新时期”概念持批评态度的徐贲指出:“(后新时期和后现代)这两个概念是作为对当今中国社会文化整体形态概括性的自我表述提出来的。它们既是对‘历史时期’的命名,又是对‘文化形态’的命名。既然这两个概念不只是对当今历史时期所作的简单称谓(如90年代),而且是对它的总体文化性质的某种界定,那么它们对当前时代的历史性质及特定的

① 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化:挑战与机遇》,《战略与管理》,1994年1期。

② 如王宁在其《后新时期与后现代》一文中把“后新时期”这一概念与“后现代性”共举,在他看来:“既然在当今这个文化共融、文化对话的时代,人为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界限已逐渐打破,各民族文学都在互相交融、互相渗透,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化和文学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一个平等对话的语境已经形成,我们在扬弃的基础上借用某个西方的概念(但并非全盘照搬)为我所用又有什么不好吗?”(载《文学自由谈》1994年3期)

社会文化批判对象和任务,就不能不包含某些基本的认识和估计。”在他看来,后新时期理论既是对新时期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的背离,也是对现代性诉求的背离:“现代化1989年以后在中国的危机非但没有导致‘现代性’这个‘未完成的事业’的终结,它反而向人们……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性质、任务和条件的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就在这些更深层、更根本的关于社会和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尚未真正被涉及,甚至它们的紧迫性和合理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和承认之前,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宣布已经进入了‘后新时期’?”^①的确,这一质问锐利地指出了九十年代初“后新时期理论”历史意识的缺失。作为在场的话语实践,“后新时期”概念及其使用,显然有必要经受知识考古方式的细致考辨。然而问题在于,出于对人文精神或现代性诉求的坚守而强调新时期的连续性,某种程度上同样也是基于对历史的某种价值预期,这一预期尽管内涵了对现代性方案中某些僵化内容的反思,但似乎没能摆脱对现代性“公民社会”这一目标一厢情愿的价值诉求。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力图延续新时期人文精神的话语实践当中,我们不难发现那种对文学和文化独立历史主体地位之想象的强大惯性。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从当下文学和文化实践经验中发现:那种整体性的和超越性的文化想象其实往往也是在特定语境(包括制度、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物质性环节)中生成的镜像,随着社会历史结构的变化,任何一种文化想象都面临着在新的关系网络当中重新确立自己合法性的问题。新时期文

① 徐贲《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文学评论》,1996年5期。

学所确立起的人文精神的内涵,虽然常常被表述为对“五四”启蒙思想的接续,但其特定的诉求和指向离不开对“文革”这一“压制性”前语境的叙述,离不开对新时期政治变革的热切期望;在客观上,新时期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人性化主体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成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一大主体的应召者,在这样的话语实践中,知识分子及其整体性文化想象,因为与社会改革的谐振而得以在政治整一性层面运行,因此,在这一想象中,社会变动所带来的问题和现象,自然就会被试图纳入文学自身的逻辑规律中加以解释,或者由文学自身所形成的某种传统对新的问题和现象施以价值判断,以纠正历史的方向。很明显,这样的文化想象在根本上是高蹈的,尽管在文学实践个体那里,其话语的生发点往往来自具体经验的滋养,但过快而缺少反思的通向某种理想化的主体和社会想象,又往往使文学在客观上脱离了现实和生活的基本面,一旦社会语境和政治环境发生变动,其话语就会失去具体的现实所指,从而沦为空洞的能指。这种空洞的能指可能依旧会在某些体制性环境(如文学教育和纯文学机制)中通过对某种自身规律的想象而持存,但相对于整个社会空间而言,它无疑已经成为一种被抽空了介入现实能力的景观。这既体现在先锋小说止步于实验性而不知所云,也表现于新写实小说中透露出的知识分子的无奈、犹疑和彷徨。

近二十年左右文学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已经告诉我们,那种对文学具有超历史的主体性地位的整体性想象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在这种想象之外,常常是历史毫不体恤地展开。我们或者说:某一时期文学能够占据文化主体地位,其实是在

特定历史时刻的社会空间中掌握了文化领导权的表征；而某一时期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而风光不再，则意味着文化领导权的旁落。就此而言，文学和文化实践根本上是与种种具体的物质性实践纠结在一起的内在于社会结构的话语行动。因此，对某一时期文学和文化实践的理解、判断，离不开对这一时期文学存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历史特征的结构性自觉；而如果不能在现实格局中找到更为基本的话语运行层面，不能在种种力量的纠结缠绕中发现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的诉求，并与之接合起来从而展开结构性的实践，对文学和文化的价值预期无疑将会落空，甚至成为影响历史判断的观念障碍。

在本书中，我仍然会使用“后新时期”这一概念来指称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和文化实践，但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后新时期”既不意味着对新时期文学人文精神传统的主动断裂而走向所谓后现代的形象，也不是出于对某种由文学表征的精神传统的认同而对当下文学和文化实践所作的否定性判断。除了时间上的简单称谓，在这里，“后新时期”更多的是对市场化转型之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革及其文化表征之特殊性和异质性的描述，在这种历史性考察的基础上，我试图从多种力量的缠绕中发现某种根本的肯定性力量，并把与这种力量的接合努力作为对这一时期不同文学、文化实践价值判断和价值预期的标准。在我看来，这种力量并非来自某种观念性的想象，而就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何以可能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也许正是历史的吊诡所在。我们有必要回到具体历史的现场，对 20 世纪 80 年代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进行简

略的结构性分析。改革开放和随后的市场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目共睹,而更深远的影响也许还要有待更长的历史时段才能见出,但其中渐次累积的多种特殊性和异质性因素的聚合已经导致社会结构呈现出历史性的特征。就其根本而言,这一特征体现为资本作为政治之外的另一种主导性书写力量进入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空间,因为资本对文化霸权的争夺,日常生活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极为重视和极力渗透的领域;同样,也因为这一变化以及传媒空间的变革,日常生活和基于日常生活的文化诉求和文化认同也就有可能成为不同话语实践争相接合的对象。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段落中,显然,后20年更典型的体现出如上的特征,而前十年充其量只能算是这个深刻的结构化转换的准备期,在这一时期,日常生活虽然也经常成为具体文学实践的初始动力,但结果总是表明,这种动力迅速被纳入政治的总体性规划和知识精英的整体性文化想象,日常生活自身的文化诉求则被有意无意地转化了。因此,出于对这一时段之历史特征的凸显,“后新时期”概念的使用是必要的。

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已经习惯于用“转型期”这样一个概念舍括其中多层次、多向度、多样化的冲突、变异和新生。倘若我们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三分法”(即属于历史事件的短时段、属于历史局势的中时段和属于深层结构的长时段)观察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变迁,会惊讶地发现这二十多年的历史奇妙地把这三个时段特征集于一身:从世界史的范围来看,二十多年来的进程无疑是内在于几百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全球推进这样一个历史长时段;从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无疑可以称得上开启了一个中时段;而从相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来说,它又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事件。对于这样一个深意只有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才能被恰当地揭示出来。“转型”,这无疑是对复杂现实的理性描述或者对于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规划,但“转型”也确实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鲜活感觉。对身处这样一个大时代开端的人们来说,要想把握历史的这种结构层面的变化,适时地沉潜到历史底层,理解日常生活的变化,也许是更为可靠的思考路径。布罗代尔主张“把日常生活不折不扣地纳入历史的范围”,在其历史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的前言中,他说道:“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你愈是缩小观察范围,就愈有机会置身物质生活的环境之中:大的观察范围通常与重大史实相适应……当你缩小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事件或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过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①这就是说,我们固然可以为市场化转型所开启的新历史时刻而对整个社会的前景充满憧憬和感到激动,但时时环顾周遭的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的种种变化,也许才能更客观地认识经济、政治层面的转型对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日常生活

^①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27页,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这一转型过程中的感觉、体验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诉求，将在多大意义上决定着转型的走向及其成败。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的巨大动力，某种程度上正源于在其开端时刻对来自日常生活领域的诉求的呼应。而检视中国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一次现代化探索，倘若不能最终深入到日常生活变革的层面，不善于倾听日常生活的种种诉求并努力与之相互协调，都很难获得持存的根基和进一步展开的动力。有学者曾指出：“如果以文化转型为表现形态的人自身现代化不能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同步展开，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可能再一次受阻，甚至停滞。”^①这里的文化转型，当然既包括文化表层的思想观念，也包括文化深层的日常生活领域的“自在的传统、习惯、风俗、自发的经验、价值观念、天然情感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其中自在的日常生活正是文化自觉转型的根基。从这一点来看，二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成功之处，无疑在于包括日常生活层面在内的整体转变，而这一转型自然是玄机四伏甚至矛盾重重的，因为经济、政治和文化表层的转换机制与日常生活层面之间仍处于纠结的状态，还不能明确地说哪一种力量完全掌握了领导权。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确定，至少在文化层面，我们从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见证了日常生活的文化兴起。

所谓日常生活的文化兴起，简单地说，就是指原本被忽视甚至无视的自在的日常生活，以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及文化诉求，深刻影响了文化表层的思想观念，并大规模参与到文化格

①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局的重构过程当中。这是整体性、多方位的参与,从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接受)的整个流程,到具体的文化产品(作品、文本),再到语言方式、价值观念甚至思维模式,日常生活的文化力量全面介入进来,改变了此前由文化精英或政治精英主导甚至辖制整个文化格局的结构模式。费正清在透视中国自1800年至1985年的历史进程之后颇为振奋地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生活正释放出巨大的能量。”^①如果他的考察延后到这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也许会为日常生活所显示出的巨大能量而感到惊愕。

当然,“后新时期”以来文化格局的变化更是多种力量、多种因素共同参与的结果,商业资本介入文化市场、新兴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文化政策的适度宽松,等等,这些都是考量当下文化格局必须要考虑的要素,但这些力量或因素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功效,又几乎无一不是与日常生活连接在一起,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或协商、或利用、或引导),并试图在日常生活领域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从而使自己在文化格局中站稳脚跟;也正是在这种连接过程中,日常生活自身的文化诉求以不同的方式(或曲折而艰难的、或直接而张扬的)表露出来,并最终在当下文化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的结构性作用。这一结构性作用可以从如下一些文化表征释读出来:首先,当代文化生产大多以大众的日常文化消费为旨归,大众的生活趣味、欣赏习惯乃至价值模式等日常化特点被最大限度地整合到整个文化生产、传播流程的设计当中,

^①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439页,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其表征则是大众传媒的发达和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勃兴；其次，在具体的文化产品，如文学艺术、电视电影等视觉文化，不仅在题材上出现了大量以日常生活的呈现为主要内容的趋势，而且在话语形态上也采取了更为贴近大众的日常化语言形式，甚至在价值内涵和美学层面，也不得不与日常生活协商和谈判，以取得某种折中意见，其表征则是精英艺术的边缘化，以及艺术的日常生活化；再次，在文化力量的构成上，伴随社会分化的加快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来自某一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的文化诉求时常会借助文化市场或交往式的大众传媒迅速崛起，生成具有可观的文化政治效应的文化现象，其表征则有文化市场的细分化、文化消费的群落化、多样文化节点乃至多元文化形态的生成，以及类似草根文化、底层文学、青春写作等等这些亚文化现象此起彼伏的出现，乃至某些以日常题材和日常价值观念重塑历史的作品出现。^①

从以上概括性的描述来看，日常生活已经在当代文化格局中以多样的形式、通过多样的渠道和平台确立起自己的结构性地位，说日常生活在“后新时期”已实现文化兴起似乎并不为过。自然，当下仍然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新的文化结构并未定型，而因为多种文化力量的共同参与和相互角力，日常生活的文化身份仍然模糊未定；同时，由于社会结构同样处在一个转型期，社会分化远没有结束，不同阶层的力量对比尚未固定，其利益需要和文化诉求也还不能最终明确，从而产生了

^① 如被指认为市民文化代表的冯小刚的《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电影，某种程度上具有将市民阶层日常生活及其价值理念崇高化的趋向。

多样化的、时聚时散、游移不定的利益关联和文化节点，日常生活自在的力量与非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之间也还会产生形形色色的矛盾冲突。但毫无疑问，如何处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如何理解日常生活，如何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最终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性重建，是当下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再也绕不过去的话题。

对于这些问题，一些当代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已经在实践中试图做出解答，具体到人文社科研究和思想领域，90年代以来逐渐开始分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基于不同的知识理路、现实立场和历史愿景，对日常生活的文化兴起这一现象做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选择并把握这一现象中的不同环节和不同问题，得出不同的诊断结果，并由此提出日常生活批判重建的不同思路，这些经验无疑是可贵的尝试，同时也参与到了日常生活的结构化转型的进程当中。在这些不同的声音当中，如下几种代表性的看法和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认为日常生活的文化兴起是市民社会逐渐形成的表征，由于“市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抑制国家权力过分膨胀的作用”，以日常生活为基础搭建文化公共空间，形成某种交往性的公域，促进理性的、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最终“透过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①，则成为自下而上推进并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理论设计。类似这种

①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3—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理论设想的持有者,往往倾向肯定以城市日常生活文化消费和文化交往为风向标的市场化的文化实践,虽然对其中一些问题有所意识,但也只是将其视为发展初期的缺陷,而不足以导致文化格局中的结构性失衡。

其二,认为以“世俗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为表征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兴起具有很大的虚假成分和很强的遮蔽现实的能力,因而构成了误导日常生活的“新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形成,既有源自资本全球化推进的根本动力,又与市场化转型中出现的“新富人”阶层有着微妙的利益关系,而这一“新富人”阶层或“成功人士”的成功往往与特权有某种暧昧关系,因而,这样的日常生活兴起的文化表征,其实质则是社会权力结构重塑在文化体系中重新洗牌的结果,是以文化表征形式展开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操控。在这一“新意识形态”的操控下,“生活实感”被压抑,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被掩盖,日常生活的文化政治功能被取消而呈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去政治化”也体现在市场化转型之后的知识生产当中)。汪晖认为,这一新兴的文化表征体系可以被视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机器,他指出:“市场意识形态机器的更为直接的表达者是媒体、广告、超级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商业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它的最为有力之处在于诉诸感官和‘常识’,即诉诸所谓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将人转化为消费者,并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愿服从其逻辑。”^①按照这一逻辑,与第

^①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5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一种乐观看待日常生活文化兴起的观点不同,他们主张应该批判和揭示这一基于日常生活平台的“新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机制,在那些被遮蔽和压抑的生活实感中,“着力去发现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良性的文化因素”^①。

其三,在主张进行日常生活批判重建的过程中,对中国日常生活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虽然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但强大的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仍然是现代化的阻滞力,“与其他一些民族相比,中国具有过分庞大的日常生活领域和过分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这成为文化转型和现代化实践的重大困境和沉重羁绊之一,是中国的个体化和主体化进程,即人的自身现代化迟迟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所在”^②。由此,应该从总体上打破传统社会中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的专制统治,使其从自在和封闭走向自觉和自为。与此相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把传统中国视为一个超稳态的社会结构,根本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对世界历史建构的结果,“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所有这些欧洲理论家都以一种与欧洲对比的模式建立他们的亚洲概念和中国概念,从而他们的历史方法本身均带有一种‘文化类型’或‘文化主义’的特点。……在这一‘文化主义’的视野内,亚洲没有历史,不存在产生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动力”^③,根据这一反思式的观察,可以在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① 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2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②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③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155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